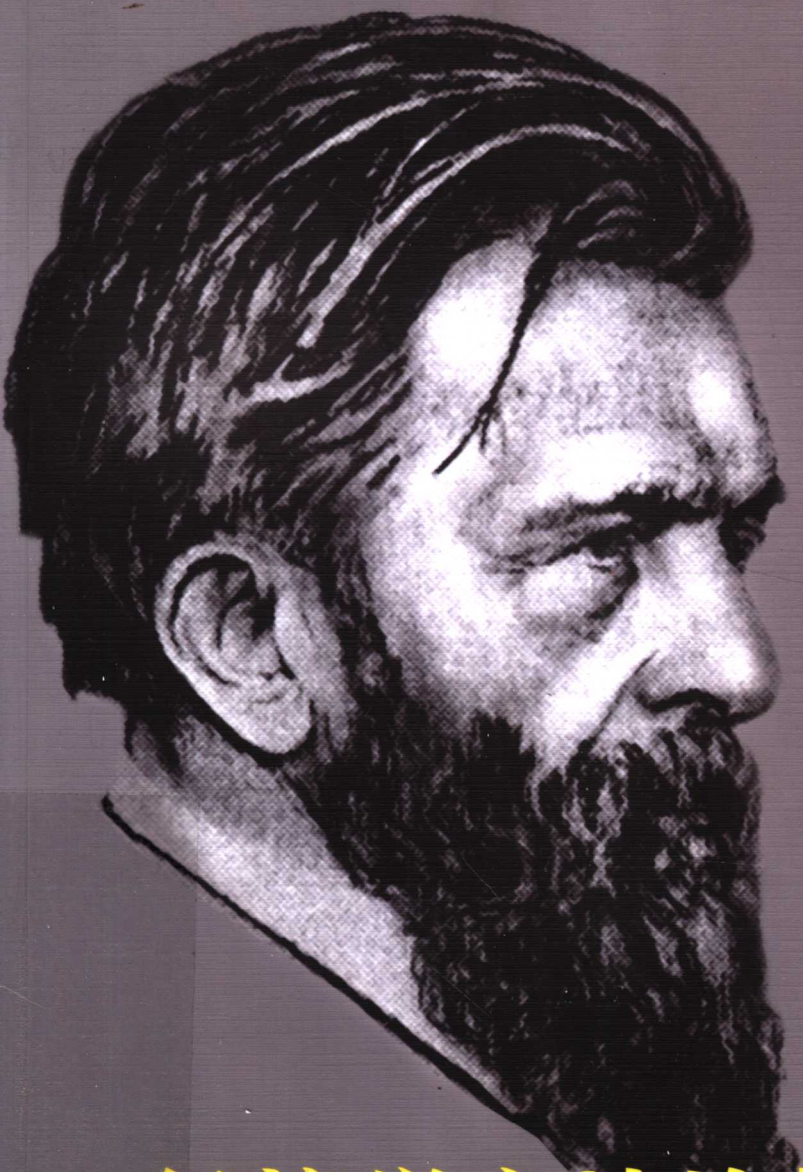


奥地利学派译丛
冯克利 主编

Carl Menger



经济学方法论探究

Investigations into the Method of the Social Sciences

[奥] 卡尔·门格尔 著 姚中秋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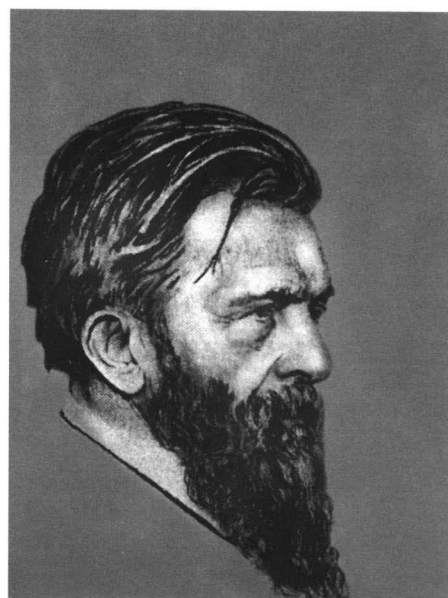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奥地利学派译丛
冯兴元 主编

Carl Menger

F011/7

2007



Investigations into the Method of the Social Sciences

经济学方法论探究

[奥] 卡尔·门格尔 著
姚中秋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经济学方法论探究 / (奥) 门格尔著; 姚中秋译.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07.8

(奥地利学派译丛)

ISBN 978-7-80225-315-5

I. 经… II. ①门…②姚… III. 经济学 - 方法论 IV. F01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7) 第096384号

经济学方法论探究

[奥] 卡尔·门格尔 著 姚中秋 译

责任编辑: 罗 晨

责任印制: 韦 舰

装帧设计: 段 芳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 67 号隆基大厦 100005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65270477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

经销电话: 010-65512133

邮购电话: 010-65276452

邮购地址: 北京市东四邮局 7 号信箱 100010

印 刷: 河北大厂彩虹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70 × 970 1/16

印 张: 21

字 数: 210千字

版 次: 2007年8月第一版 2007年8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225-315-5

定 价: 32.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公司联系更换。

翻译说明

本书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创始人卡尔·门格尔继 *Grundsätze der Volkswirtschaftslehre* (1871 年, 英译本译为《经济学原理》, 汉译本译为《国民经济学原理》, 刘絜敖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 年) 之后, 所写的一本经济学专著, 德文书名为《对于社会科学, 具体而言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方法的探究》(*Untersuchungen über die Methode der Sozialwissenschaften und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insbesondere*, 1883)。

在这本书中, 门格尔强调了包括经济学在内的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区别, 探讨了经济活动主体知识的不完备性问题, 以及制度的自发形成问题, 这些都是当代奥地利学派讨论的重要话题。

由于译者不通德文, 所以, 本书系根据英译本译出。据译者了解, 本书英译本有两种: 一种是 1963 年出版, 题为《经济学与社会学的问题》(*Problems of Economics and Sociology*, ed. Louis Schneider; reprinted,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85)。译者是根据下列英译本译出: *Investigations into the Method of the Social Sciences*, translated by Francis J. Nock; Grove City, PA.: Libertarian Press, Inc., 1996。

由于系从英文转译, 所以是否准确传达了门格尔的思想(语言风格当然更是无从谈起), 笔者心怀忐忑。不过, 有多年从事

译事的朋友相告，对于德文著作，从高质量的英文译本转译，有时反而能够更为准确，我也只能以此安慰自己。

此外，译者又就自己所知，译出若干可能对读者了解门格尔的著作和奥地利学派的方法论有助益的几篇当代文献，作为参考。

原文中有若干法文和拉丁文段落和语句。法文部分是由我的朋友谢学敏君介绍新华社的杨京德老师热情帮助译出的，拉丁文是由陆元昶先生和我的朋友孙怀亮介绍的雷立柏教授（Leo Leep）译出的。对他们无私的帮助，我在此表示最诚挚的谢意。

译者

2006 年 9 月

卡尔·门格尔

(Carl Menger, 1840~1921)

现代经济学的奠基人，奥地利学派的开创者。

1860年毕业于维也纳大学；1871年出版成名作《国民经济学原理》；1876年担任奥地利王储的导师；1879年被任命为维也纳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1883年出版代表作《经济学方法论探究》；1903年辞去了一切教职，致力于修正和扩展自己原有的经济理论框架。

目 录

前言	1
----------	---

第一部分 经济学与历史学

第一章 经济学的研究	15
第二章 理论经济学的形式化性质	21
第三章 理论性知识的特殊性质	31
第四章 一般的与具体的研究	35
第五章 精确的取向与实在的 - 经验的取向	48
第六章 理论和历史学是不可分割的学科	57
第七章 自利的教条	65
第八章 “原子论”的指责	74

第二部分 历史主义的视角

导论	83
第一章 理论经济学中的历史主义视角	88
第二章 伪历史主义的取向	101
第三章 经济制度与规范性法律	109

第三部分 认识社会现象的有机观

第一章 社会现象与自然有机体	115
第二章 历史发展的非意图后果	126

第四部分 各个时代的历史学派

第一章 历史学派的古代渊源	151
第二章 德国历史学派对于历史法学派的无知	161
第三章 德国历史学派的政治经济学	168

附录一 国民经济	185
附录二 理论经济学及其规律	190
附录三 实用经济学与理论经济学	196
附录四 经济学的术语与分类	199
附录五 人的行为与自然规律	207
附录六 经济的需求与目的	209
附录七 亚里士多德的国家起源理论	213
附录八 法律的“有机的”起源	216
附录九 伦理的取向	230

卡尔·门格尔	理查德·瓦格纳/235
方法论大论战	萨缪尔·博斯塔菲/245
亚里士多德主义、先验主义、本质主义	巴利·史密斯/253
奥地利学派的方法论原则	格里高利·克里斯坦森 等/260
现象学与经济学	G. B. 麦迪逊/283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方法论	劳伦斯·H. 怀特/297

前 言

政治经济学领域的理论探究，特别是在德国，还根本没有发展出有关这门学科的正确的方法论。相反，德国经济学家——在一定程度上也包括他们在德国之外的同道也是一样——反复思考的主要是政治经济学及其各个分支的性质及概念，其真理的本质，如何思考经济问题才能够正确地处理现实状况，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他们没有认真考虑实现经济学研究目标的知识路径，因为这些目标本身仍然大成问题。

其实，这种现象是晚近才出现的。就在不久以前，政治经济学的性质和其真理的形式化（formal）性质，似乎刚刚确立，我们学科领域的理论探究确实已经在思考其真正的方法论问题。政治经济学是“研究国民经济的规律的科学”，这种观念已经确立，并认为已经足够了，因为如何看待政治经济学，作为一个纯技术问题，已经被解决了。科学讨论已经可以进一步探究这些规律是通过思辨还是通过经验、是通过演绎还是通过归纳来掌握的问题，探究在社会现象领域、具体而言在国民经济领域，什么样的具体形式适合于这些方法。它已经可以进一步探究真正的方法论所涉及的其他诸如此类的问题了。

当然，我们假如要着手更全面彻底地探讨方法论问题，就必须改变这一切。我们学科领域的学者必须要意识到，政治经济学在其理论与实用（practical）分支中展示的是某种具有完全不同

的形式化性质的知识。因此，我们就不应说政治经济学的一种方法、唯一的方法，而只能说它的诸多方法。获得知识的途径和研究方法是由研究目标、由我们所获知的真理之形式化性质所指引的。理论经济学和国民经济的实用科学的诸方法，不可能是相同的。但即使在研究方法论问题时坚持这种根本性区别，或者即使认为只有理论经济学才是至关重要的，更深入的考察也依然会表明，即使是“现象的规律”这样的概念也是含混的，是由某些完全不同的形式化性质的真理所构成的。因此，将政治经济学，或者哪怕是理论经济学视为一门有关“国民经济的规律”的科学，也是不完全正确的。

古典经济学诞生之后，大部分学者都形成了这样一种有关经济学的概念：经济学就是研究国民经济规律的科学，而经济现象的共存与接续（co-existence and succession）的规律，也就等同于自然规律。他们没有意识到这种知识具有不同的性质，因此，他们也没有意识到，上述看法其实是很不清楚的。不仅如此，将政治经济学视为一门类似于物理学和化学之类的学科的看法，与我们这门学科中的个别人士以前提出的看法（解剖学－生理学的观点 [anatomical－physiological point of view]）之间的不同，被人们更清楚地感受到了。将国民经济视为一个有机体，它的规律类似于解剖学和生理学中的规律，这样的看法与从物理学角度看待经济学而得出的看法，恰成对立；经济学研究中的生物学观点与原子论的观点也形成了对立。

科学的探究并没有由于方法论问题的含混而止步不前。已经有人指出，一般意义上的社会现象，具体而言的国民经济现象，会因为国家的不同、地区状况的不同，尤其是由于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而各有其具体特征；它们显示了时间、空间上的差异，这些差异不可能不对相应的规律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从这一角度看，要想获得不受时空条件影响的有关国民经济的普遍的、永恒的规律，并由此获得一门建立在这样的规律基础之上的科学，似

乎是不可能的，纯属妄想；这样似乎是从现象的“完整的经验性实在”（full empirical reality）做出的无理的抽象。因此，考察经济现象的时空差异，似乎不仅是“实用经济学”领域，也是理论经济学——即“研究经济规律的科学”——领域的一条必然要求。

还有一些人更进一步，他们相信，他们不用非得承认自然规律与国民经济规律之间有什么相似之处，他们认为，国民经济规律完全是历史发展的规律（体现着不同国家经济史的一致性 [parallelisms]），是大数规律（laws of great numbers）（反映着国民经济统计数据间的一致性）。在对我们这门学科的原于论式（atomistic）看法与有机的看法之外，又出现了历史的—哲学的研究取向和统计的—理论的研究取向，他们希望在理论经济学中保留国家的和历史的视角。

好像这还不够，又有一种研究取向走红，它对于政治经济学就是“研究国民经济规律的科学”的观点提出质疑。相反，它认为，政治经济学与历史主义法学和历史主义语言学一样，是一门特殊的历史科学，而在国民经济研究领域中，历史主义的理解是唯一正确也是唯一可以实现的研究目标。这样，在关于经济规律之本质、因而也是关于理论经济学之本质的多种看法——事实上，也是对这些规律之本质的看法——之外，又出现了这种将政治经济学视为一门特殊的历史科学的观点。

上述所有这些观点之间的分歧，并不仅限于对我们这门学科的真理之形式化性质的看法存有分歧。有些人认为，经济学是研究“经济现象”的规律的科学，而另一些人则认为，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它仅仅孤立地研究国民生活的一个侧面而已。有一种理论认为，研究国民经济现象时，不能脱离国家的总体社会与政治发展状况，这种理论在经济学家中有很多支持者。关于我们的学科中之真理的形式化性质及我们的学科本身的性质，本来就已经众说纷纭，在这之外，又出现了有关我们这门学科所应研究的

现象领域之范围和界限的争论。事实上，很多人甚至不得不怀疑，一般意义上的政治经济学是否还可以被视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而不只是一门普遍的社会科学的有机组成部分。

目前已经持续了差不多半个世纪的讨论，都围绕着这些研究取向是否正当而展开，这些良好取向一方面是互相冲突的，但另一方面又融合互补。无需多说，我们学科的方法论的这种发展状况不可能是良好的。关于实现政治经济学领域（真正的方法论领域！）的研究目标之途径的探究，如何才能得出一个令人满意的结论？假如这些研究目标本身就如此地令人质疑，那么，学术界怎么会有兴趣认真地讨论相关的问题？

而我之所以写作本书，就是因为觉得，政治经济学领域存在实现上述目标的迫切要求。本书也参照我们目前对于理论探究的成果，主要关注的问题是确定政治经济学、它的各个分支、它的真理的性质，一句话，是确定我们这门学科领域的研究目标。狭义上的方法论将留待以后进行探究，因为，一旦我们就这里研究的基本问题达成若干共识，就肯定会立刻引发研究狭义的方法论的兴趣。

只要形成这样的共识，解决上面所说问题的第二个部分，就可能比乍看起来容易得多。不管怎样，一个人，只要多少熟悉相关文献，就会知道，哲学研究在极大程度上从一开始就转向了真正的方法论问题，这样的哲学探究何以在这些问题上得到其最有价值的结果。我们首先得搞清楚国民经济领域的研究目标，我们可以希望，在这之后，确定实现这些目标的路径，不是一件太难的事情，条件则是，那些有志于确定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的人士，能够将一般性的理论探究的结果运用于解决我们这门学科的特殊问题，认真地运用它们——比以往那些人士更为认真和明智。

当然，我们将会看到，逻辑学家的著述对于我们探究政治经济学领域的研究目标，不会有任何用处。关于这一知识领域中的真理之性质的洞见，只能在全面地、恰当地考察我们将要研究的

现象领域，及这一领域对我们的学科提出的特殊要求后才能获得。无可置疑的是，在上述这个方面，我们不应当指望从逻辑学家那里得到多少启示，相反，他们倒完全可以指望从我们这里得到很多教益。不过，最近，在德国经济学家中，有些人却试图从目前占据主流的逻辑学家有关我们的学科的研究目标之著述中寻找什么教益。毫无疑问，我们只能说，这恰恰表明了在我们这门学科的理论结构中，这个部分的状况确实不能令人满意。不过，我确实相信，只要我们就政治经济学中的真理性质获得比较可靠的结果，则一般性的理论探究对于我们将是非常有益的。这将有助于我们深入考察确定这些真理及实现这些结果的知识路径的形式化条件。

确实，即使那样，对我们的学科来说，也只有很少的助益，这门学科现在本来就远远落后于其他学科。事实上，我不能不克制自己，我得说，我并没有过高地估计方法论对于一般性研究、具体而言对于政治经济学领域的研究的重要意义。最重大的科学成果都出自那些不怎么关心方法论探究的人士之手，而最伟大的方法论专家反倒很少能够证明自己是某门学科中非常杰出的学者，尽管他们极其清晰地阐述了这门学科的方法。在方法论的阐述与一门学科令人满意的发展之间，有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只有该学科领域的天才人物才能贯通这两者。实证性研究（positive research）通常会在方法论并无发展的情况下创造出一门学科或使其发生划时代的变革。而没有天分的方法论是永远做不到这一点的。对于一门学科领域中的二流成就来说无比重要的方法论，对于留待天才来解决的那些重大问题，却并没有多大价值。

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方法论的探究才确实是对于学科的发展来说最重要、最紧迫的问题。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这种情况可能出现在这样一个知识领域，在这里，人们已经遗忘了经由对于研究对象之性质的认识而获得的有关研究目标的准确感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人们对于该学科的次要问题赋予了过大，甚

至是决定性的意义。有一个势力强大的学派所支持的错误的方法论原则已完全掌控了局面，人们用片面的标准来判断该知识领域的一切研究活动。一句话，该学科的进步之所以受到阻碍，是因为错误的方法论原则盛极一时。在这种情况下，澄清方法论问题，确实是取得科学研究进步的前提，即使那些原本更愿意将其精力用于解决学科中的具体问题的那些学者，也不得不卷入方法之争。

在我看来，这就是目前德国政治经济学领域所处的状态。这种状态，对于那些没有仔细地留意这门学科近几十年之发展的人士来说，是难以理解的。

关于我们学科的性质、它研究的问题、它的范围，尤其是在确定政治经济学领域的研究目标时所产生的种种冲突，最初，并不是由经济学家们对于理论探究的兴趣而形成的。之所以出现这些冲突看法，是因为人们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亚当·斯密及其追随者留给我们的经济学理论缺乏可靠的基础，即使对于最根本性的问题，他们也没有找到解决办法，而他们的理论对于国民经济的实用科学尤其不能提供充分的基础。甚至在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形成之前，就已经有一种观念得到越来越多人士的支持：从前关于我们的学科已经达到完美状态的流行看法，其实是错误的，恰恰相反，这门学科需要彻底地予以修正。

一旦人们产生了这样的想法，则可以有三条思路来革新我们的学科。一种思路是，在前人关于我们学科的性质、问题的看法和亚当·斯密所创建的学说的基础上，从政治经济学诞生时的基本观点出发对政治经济学予以完善，或者也可以开辟研究的新路径。这里的改革，一种是改革以前的做法，另一种是改革以前的研究理论。

除了这两种改革取向之外，人们还可以采取另一种思路，其性质和方向与上述思路有所不同，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将上述两种改革观念融为一体。革新政治经济学，依然可以从以前的立场出

发,但又应当寻求开辟新的研究取向。单纯一种研究取向(research orientation)不可能涵盖所有的研究课题。相反,要提高我们对于现实世界及其发展过程的认识,增进我们的理论和实用知识,就必须不断地发现获取知识的新的取向。单纯一种研究取向,即使本身是完全正确的,若从我们的学科所要解决的全部问题的角度来看,也是不够充分的。对于一门学科的理论来说,尤其如此。只有在所有正当的理论研究取向得到令人满意的发展,并将其研究成果组织为一个理论纲要或者说组织为一个理论体系之时,理论才算达到完善状态。在理论性的自然科学中如此,在一般性的理论社会科学、在理论性的国民经济科学中也同样如此。开辟理论研究的新分支可能伴随着对于从前的理论研究的革新。

上面提及的革新经济学的三种思路中,第一种表面上看起来是最简单、也是最为显而易见的,但实际上,由于不止一个原因,这种思路会面临异乎寻常的难题。所有国家最杰出的才智之士沿着以前的道路无法获得的东西,现在有待于我们去掌握,曾经令天才人物束手无策的东西,也有待于我们去了解。不仅要提出批评意见,或开拓某种更宽广的视野,还需要创造出某种实证性的东西。将要被采纳的研究取向要求其代表人物具有某种能够从事实证性研究的原创性。正是在这样的知识领域,对于学者的才智提出了最高的要求,尽管这里也面临无与伦比的难题。

但由于另外一些原因,这里所说的努力,对于解决我们所说的紧迫问题^①,并无多大价值。因为,没有任何时候,比杰出的才智之士已经无所作为的时候还依然根据以前的研究思路革新一门学科更困难的了,起码乍看之下,也没有比这更无益的了。因为他们的权威性所施加的压力,会削弱那些竭力追随他们的人的信心,另一方面,又会妨碍人们承认已经取得的成就。它压制了具有创造力的才智之士的活力,也遮蔽了接受这些理论的才智之

① 指革新经济学。——中译者注

士的自由判断。

综合考虑所有这些麻烦，将使我们认识到，依据对于一门学科原来的看法来革新它非常困难，因而实在是没有多大吸引力。经济学理论，即主要由英国经济学家创造的所谓古典学派，没有能够令人满意地解决作为一门研究国民经济规律的学科所面临的问题。而它的理论的权威性却成为我们的负担，阻碍人们沿着亚当·斯密之前几个世纪的学者在为确立理论社会科学这一重大问题所奉行的路线上取得进步。

革新我们的学科的另一思路似乎更简单，也更值得一试。目前的状态之所以不能令人满意，并不是因为学者的能力不足以解决学科领域里的问题，而是由于采用了某种错误的研究取向，要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就必须采取一种新的研究取向。不管是谁，只要能够确立这样一种新取向，就可以被视为政治经济学的改革者，即使他实际上并没有做出什么值得一提的事情，真正地深化和证明这种取向的正当性，即使他对于直接解决经济学的问题并没有做出什么贡献。即使他仅仅满足于开拓广泛的视野或在一种本身具有正当性但却截然不同于政治经济学的知识领域中进行研究，即使他仅仅满足于汇编——而没有连贯的认识——那些从前被认为是谬误并受到最强烈批评的研究取向所得到的结果，他也仍然是政治经济学的改革者。

多种因素有助于推进上面的努力。在语言研究、政治科学和法学领域，各种新的研究取向已经占据了优势，并产生了一些成果，这些成果没有按照过去学术界和公众舆论——尤其是在德国——的标准来衡量，这些成果被认为没有价值，而其实，这些成果的贡献在很大程度上被高估了，起码在最初一段时间内被评估过。将这些领域的成果运用到我们的知识领域，这种想法难道不是最显而易见的吗？要想以政治经济学改革者的身份出名，除了敏锐地注意到研究的共通之处外，很少再需要别的什么素质。根据从前关于政治经济学的观念来革新政治经济学，既很困难，也没有什

么可炫耀之处。而一种新的研究取向之名声，却不需太多精力就能获得。因此，没有人会对下面的事实感到奇怪：在德国真正具有学识的经济学家中，理论的发展是每况愈下。因为，那些渴望一朝成名的人物，在新的研究方向上总是可以搞出点名堂，尤其是当他们走上著名学者予以肯定的那种方向时，甚至走上不那么著名、缺乏研究国民经济的重大关系、并对国民经济现象进行精确分析的水平的人物予以肯定的方向之时。

在这样进行创新的时候，这些人确实忽视了政治经济学的形式化性质与其他学科的形式化性质之间的根本差异，因此，才会多多少少机械地借鉴那些学科的基本原则，甚至照搬其研究结果。他们尤其没有认识到在历史主义的基础上改变了法学的那场学科运动的真正趋势。我下面将会证明，一些很罕见的错误理解，在德国那些试图改革政治经济学的人士所发动的改革运动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因此，他们搞出来的新的研究取向，在不小的程度上，不过是某种令人误入歧途的类比的结果，是没有正确认识到政治经济学的真正问题所在的结果。

不过，即使一种本身确实正当的新的研究取向被人接受，也未必是因为人们全面彻底地意识到了科学必须要解决的国民经济领域的一整套问题。我们到处都会看到这样的现象，某种具体的研究取向，常常只具有比较次要的价值，但它却使得革新政治经济学的事业完全依赖于这种研究取向的成功与否，从而完全否定了其他研究取向的合理性。在德国，试图通过开辟新的研究方向而改变政治经济学令人不满意的状态的愿望，却带来了关于我们这门学科及其问题的一系列看法，这些看法，一部分是误导性的，一部分则是偏颇的。它导致了这样一些观点，这些观点将德国的经济学家区别于所有其他国家的这门学科的文献中所体现的学术运动。事实上，它产生了这样一些观点，这些观点导致德国学者所取得的成果，由于其偏颇性，而根本无法为德国之外的经济学家所理解。